

# 教不嚴 大學之過

香港暴力持續5個多月，學生佔被捕人數約4成，當中不少是大學生。大學生已經成人，應該對自己的違法犯罪行為負責。那麼，大學應該負上什麼責任呢？這是許多人關心的事情。教不嚴，大學之過。大學失職的原因主要是三個：第一是平時放任學生；第二是遇事推卸責任；第三是缺乏法治觀念。

顧敏康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2015年，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發表有關「港獨」文章遭前特首梁振英先生批判後，港大並不當回事，也未採取措施，導致《學苑》繼續發表「港獨」文章，而此後港大學生會幾任會長更是「港獨」的積極宣揚者。大學管理層對於學生的違法言行輕描淡寫，不敢認真處理，埋下了今天「港獨」暴亂的種子。

暴亂發生後，校園成為暴徒的集結地，有人將一些大學稱為「暴動大學」，從側面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問題是，一些大學的高層並沒有認真反思自己的失職，而是將責任推向政府，下面舉兩例證明。

## 大學不能縱容違法犯罪

香港理工大學11月25日傍晚發聲明稱：鑒於現時的緊張情況，我們已經再次聯絡警方，嚴正要求警方在登記校園內留守者的身份證後，讓他們和平離開校園；校方希望校園能早日解封，恢復安寧。這個聲明含有幾個資訊：第一，員警不可以逮捕暴動疑犯；第二，員警包圍校園，破壞安寧；第三，校方沒有任何責任，反而如理大一位副校長所說，是警方危害大學教育工作，實在無理。

到了11月27日晚，警方見記者，油尖警區指揮官何潤勝總警司通報香港理工大學事件最新情況。何潤勝表示，理工大

學校方派出的工作小組今天已經完成了第二次搜尋，沒有找到留守者。次日，警方安全小組及刑偵人員會在校方的陪同下入校，進行搜證處理。員警的做法有理由：既然沒有暴徒留守校園，員警也沒有必要包圍校園，但必須完成搜證工作，履行應有法律職責。

由此，又想起九間大學校長的聯合聲明：「當前的社會紛爭，已令大學校園化身成政治角力的場所，而（香港）政府的響應至今未能有效化解危機。任何認為大學可以化解這場危機的期望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這些極其複雜而艱難的困局，並非由大學造成，亦無法透過大學紀律程序來解決。」大學一味將責任推給政府，將自己教書育人的責任推得乾乾淨淨，對違法亂紀者不給予紀律處分，其實是縱容。

## 大學要樹立法治正氣

大學高層既有教育失職，又表現為法治觀念缺失，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對「港獨」分子竟將校園作為違法犯罪的高點不問不顧，面對指責時還以言論自由加以輕描淡寫。二是對某些教授和專家學者披着人類靈魂工程師外衣支持「港獨」和對暴徒網開一面，不作處罰。三是不能有效保護內地學生的人身安全，令他們不得不撤離。四是當校園發生學生暴徒欺凌其他仗義執言師生時採取息事寧人的做法，阻擾警方進入校園。

大學憑什麼阻止警方進入校園執法呢？大學因為自治就可以成為「獨立王國」？或者因大學校園屬於私人土地，員警便不能進入？根據普通法慣例，員警如果有合理懷疑罪案正在發生，不用搜查證都可以進入私人

住所，更何況大學校園。香港《警隊條例》清楚規定：如任何警務人員有理由相信任何須予逮捕的人已進入或置身在某處，則居住在該處或管理該處的人在該警務人員提出要求時，須容許該警務人員自由進入該處，並給予一切合理的便利，以便他在內搜查。

在所有的大學校長中，法治觀念最差的當屬中大段崇智校長了。他從拍拍批評學生不懂禮貌和破壞設施，到打倒自我，憑學生一面之詞就發公開信，不分黑白譴責警方「使用不當暴力對待學生」。段校長此舉當然深得暴徒學生歡迎，中大學生會於11月18日下午發聲明回應校長段崇智的公開信，表示了解到校長願意與學生同行的決心。

誠如警方指出，段校長的公開信犯了一個基本的法律錯誤。警方公共關係科署理總警司江永祥回應指：任何人在拘捕行動中有不滿或受屈，應挺身而作出投訴及提供資料。「在段校長的信或者聲明裡面，是連一些最基本的資料，我們都見不到。」缺乏證據而憑空指責，段校長真需要惡補法治觀念了。

據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於上週公佈的世界大學學科排名顯示，香港部分大學個別學科出現較大跌幅。這一機構於9月公佈的世界大學排名也顯示多所港校排名下滑，原因包括教學和研究環境上得分相對不穩定。香港的大學管理層應認真反思教育理念，建立健全校紀校規和有效地執行工作，才能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才能繼續吸引優秀教師、學生到香港來工作、學習和交流。

# 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成功實踐啓示香港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紀念澳門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讚賞澳門全面貫徹實施《基本法》各項規定後，要求香港「也要很好地領會中央精神，領會憲法，領會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的關係」，並且指出有些工作中央對香港和澳門的要求一樣。在同一場合，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引述習近平主席所言，指澳門「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方面樹立了榜樣」。

## 港管治危機暴露諸多制度漏洞

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成功實踐啟示，香港一直未能主動承擔起基本法所賦予的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現在又出現嚴重的管治危機，暴露出諸多制度漏洞與機制缺陷，直接威脅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香港落實《基本法》的一大缺位，是未能按照《基本法》第23條訂立《國家安全法》，澳門則早已完成這方面的立法並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還主動在立法會選舉修改法案中增加「防獨」條款，並完成《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半年來修例風波引發暴亂，恰恰說明23條愈遲立法，對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以及對香港繁榮穩定的威脅，都越來越大。

四中全會提出「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啟示23條立法不能一拖再拖，應該適時提出議程。港澳辦主任張曉明11月9日在港澳辦網站發表文章解讀四中全會精神稱：「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也未設立相應執行機構，這也是近幾年來「港獨」等本土激進分離勢力的活動不斷加劇的主要原因之一。」強調「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強化執法力量，已成為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面前的突出問題和緊迫任務。」

## 23條立法特區政府責無旁貸

香港國家安全法律缺位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已經有目共睹，近半年的暴亂充分暴露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短板，埋下了社會動盪的重大隱患。

不得不正視的是，維護國家安全的23條立法似乎成為香港社會的「禁忌」，而分裂國家的「港獨」思潮和暴亂卻在香港社會蔓延和爆發，這種本末倒置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澳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已經

走到了香港前面。澳門不僅為23條立法，也已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本港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應該借鑒澳門的成功經驗。

反對派聲稱，如果中央用治理澳門的方式治理香港，香港市民一定不會接受。反對派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港澳同樣實施「一國兩制」，有些工作特別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中央對香港和澳門的要求一樣。特區政府之所以未能解決現時的局勢，恰恰是23條尚未立法，缺乏有效的法律武器對付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責任，既是香港作為國家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應有之義，也是世界通行的政治倫理和法律規範要求。23條立法不能再拖，特區政府責無旁貸，排除萬難也要完成立法。廣大香港市民也有義務和責任支持立法。如果香港不能完成23條立法而發生動亂，《基本法》第18條第四款規定，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 鄭文傑被利用作反華政治工具

江樂士

英國著名小說家 Walter Scott 曾經說過：人一旦說謊，就得不斷編織謊言來自圓其說。

英國駐港領事館前僱員鄭文傑的個案，怎麼看也是一樁詭異之事。他於8月到訪深圳期間承認嫖娼，被行政拘留15天。在事發3個月後的11月20日，他突然在香港以外的地區露面，聲稱在深圳拘留期間遭到肉體和精神上的虐待。中國駐倫敦大使館已強烈否認此等指控。

鄭文傑在此時突然露面，疑似是有人精心安排：他的片面之詞立即被某些群體全盤接納。英國外交部急召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對鄭被中方「虐待」的指控表示憤慨。

事件在此刻出了一些轉折。英國外交部並沒有給予鄭（和其女友）渴求的英國護照，而只是給他為期兩年的簽證，他將無法藉住滿5年而獲得居英權。事件由此變得更撲朔迷離。

鄭文傑在3個月前事發時不開口，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突然對中方作出指控？這可能是事件最詭異之處。對這個問題，稍稍調

查就不乏重大發現：就在鄭文傑宣稱遭到酷刑之前，英國外交部政務次官惠勒（Heather Wheeler）透露，英國計劃着手立法，以便英國政府能夠對外國嚴重侵犯人權者予以制裁。儘管該法案是早前提出的，但最新消息指惠勒提議讓該法案適用於香港。

看來，英國反華政客正在利用所謂的鄭文傑事件來製造輿論，為發起制裁香港的行動鋪路。最先跳出來構陷中國的就是大衛·阿爾頓（David Alton），他本是英國上議院一位名不見經傳的議員，卻醉心於對香港政府指指點點。他與反華智庫「香港監察」關係密切，其本人也對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亦步亦趨。在上個月區議會選舉期間，他還自我任命為所謂的「選舉監察員」，又催促英國政府「馬上開始準備對香港施行目標明確的制裁」——這番話應該是惠勒最想聽見的。

反華勢力的佼佼者莫過於英國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圖根達特（Tom Tugendhat）。他叫囂「英國必須對抗一種專制治理模式」。就在上個月，該委員會發佈了一篇迄

今最為偏激的香港報告，該報告甚至促請英國當局重新審視容許英國法官出任香港終審法官的安排。

自從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正式成為法律之後，香港本地的敵對勢力隨即隨風起舞，打頭陣的正是專業政治搞手黃之鋒，他聲稱「眾志」還要游說其他西方國家加入制裁行列。與黃之鋒一丘之貉的張昆陽，也就是那個突然冒出來的「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也說希望英國和加拿大能效法美國制裁香港。

看來，為了制裁香港，鄭文傑是被那些反華政客利用了。雖然他丟了飯碗的具體細節無從得知，但是情況似乎是這樣的：一旦僱主意識到鄭文傑是一個「負資產」，就會立即對他退還三金。這是一場悲劇——有人惡意操縱、利用領事館的初級職員作政治工具，這些政客毫無信譽可言，而最大的輸家是鄭文傑。現在，中英雙方都指斥他說謊，而他被政客玩弄一番後，只得到短期簽證作為報酬。

（本文作者為前刑事檢控專員。文本英文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

# 斬斷外部反中亂港勢力「黑手」



楊志強 資深評論員

美方不顧中方堅決反對，執意將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法。針對美方霸權主義行為，中方對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等美國非政府組織實施制裁。美國策劃和參與「顏色革命」，是通過一系列喬裝成基金會的非政府機構進行的。這一類基金會大多由美國政府出錢資助，是替美國政府執行顛覆使命的工具。

## NED頻頻干涉中國內政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是美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有「第二中情局」之稱，資金幾乎全部來源於政府撥款。「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是NED成立後設立的主要分支機構之一，「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IRI）也是NED旗下機構。NED的主要活動方式是提供經費資助，將美國國會撥款再轉撥給旗下的4家美國非政府組織，即「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IRI）、「美國國際私企業中心」（CIPE）以及「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ACILS）」。

NED將中國作為重點插手地區，每年預算超過千萬美元，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勢力，直接干涉中國內政。NED及旗下機構多年來通過「禍港四人幫」之首黎智英等反對派組織和人物提供大筆資助，NED與NDI不僅與李柱銘、黎智英、李卓人等亂港頭目過從甚密，更培養了黃之鋒等新一代亂港分子。

人權觀察曾三度聯同香港人權監察及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向特首林鄭月娥發出公開信，要求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所謂警方使用過分武力及作出不當行為的指控，信件獲逾70個本地、國際相關組織聯署。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會長曾參與聯署，向美國眾議院院長佩洛西及多名主要議員發出公開信，要求佩洛西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自由之家還曾發表年度新聞自由指數報告，2019年將香港排在中等次的73位。

美國這些喬裝成基金會的非政府機構，不僅在國際聲名狼藉，在美國國內也引發了許多抗議。美國政壇元老、三屆總統候選人羅恩·保羅曾在國會痛斥，NED以「推廣民主」為名推行美國少數利益集團的主張，自身管理不善，貪污現象嚴重，不但浪費美國納稅人的錢，而且在國際上給美國處處樹敵，並呼籲國會取締這一組織。

## 特區政府應向美國還以顏色

美國企圖將香港打造成反中亂港的橋頭堡，特區政府應配合中央政府作出相關行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這些事務屬外交事務，本港是否跟隨制裁這些非政府組織，會按中央要求作配合和跟進。雖然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但被國家列入制裁名單的組織和人員，如果仍能在香港以各種方式支援和教唆暴徒作出極端暴力的犯罪行為，中央政府的反制豈非落空？

因此，特區政府應理直氣壯，依法斬斷伸向香港的外部「黑手」，包括引用《社團條例》取締違法亂港的美國NGO、商業機構，追查這些機構有否干犯《刑事罪行條例》，追究機構負責人的刑責；考慮啟用緊急法，徹查美國的相關組織在香港的金錢交易是否用來資助暴動，查明屬實，則應凍結資產，斬斷暴力的資金、技術支援；還可對來港目的是資助、煽動、參與或指揮暴動的美國人員，不發簽證；宣佈禁止大力推動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美國數名鷹派政客入境香港，提升止暴制亂的力度，向美國還以顏色。

兆明

不出所料，在不到一個星期之內，美國政府又一次通過打「人權牌」製造事端：如果說上個星期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以「人權」和「民主」話題挑起事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那麼昨天美國眾議院通過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就是再次以升級版的「人權牌」向中國施壓、力圖令事端進一步升級。所不同的是這次的「人權牌」內容更荒謬、勢頭更兇猛。

美國真的關心香港和新疆？顯然不是。不論是香港牌、新疆牌，都不過是美國為了在貿易戰中獲得優勢地位，而不惜顛倒黑白、罔顧是非炮製的話題，其目標十分明確：通過佔據所謂的道德制高點，博得「盟友們」的同情心，並與自己一道為虎作倀、孤立中國，藉此在中美貿易戰中增加砝碼、佔據優勢，擾亂中國的談判節奏，從而為自己贏得最大利益。

## 「人權牌」的本質是「酸葡萄」

用「吃不到葡萄的狐狸」來形容美國政客一點都不為過：他們見不得中國在人權、民主、自由等領域所發揮的制度優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更見不得自己所信奉的「美國最強大」卻在這些領域相形見绌、敗下陣來，所以，他們就開始肆意抹黑：對於香港，支持暴行、縱容暴徒，把警察的正當執法描述成黑警暴力，把政府的依法施政污蔑成毫無人性；對於新疆，他們把打擊恐怖主義和分裂勢力描繪成侵犯宗教自由、把學校描繪成萬惡的集中營。

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不甘承認自身的失敗：在美國，貧富差距加大、實體經濟空心化的背景下，「白人至上」的傾向正在美國社會野蠻生長乃至強化，族裔矛盾加劇，針對少數族裔的歧視和肆意攻擊等惡性現象頻發：從桑迪胡克小學到薩瑟蘭斯普林斯的教堂，從拉斯維加斯的音樂會到埃爾帕索的超市……美國政客無法解決本國的人權問題，就以抹黑別國為業，套取個人政治利益，充分暴露出當今美國為了維持所謂「霸權」，顛倒是非、違背國際社會發展大勢的倒行逆施。

事實上，中國的制度優勢，是美國政客的眼中釘，也是其最為害怕的。以新疆為例，中國政府依法開展反恐和去極端化鬥爭，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動多發頻發勢頭，保障了公眾的生存權、發展權等基本人權，地區經濟持續發展，宗教和睦和順，公眾的幸福感獲得安全感大幅提升，三年來，新疆沒有發生暴恐事件。這樣的成就，充分說明了在中國的制度優勢下，人心齊、泰山移，再大的困難、再棘手的問題，中國政府都有信心也有能力解決好。

## 從「貿易戰」到「新冷戰」

「貿易戰」的背後，實質上是美國開啟的新冷戰。只不過，新冷戰的模式與戰場在於經濟、科技、金融。但美國忽略了一點：今天的中國所帶來的經濟挑戰要比蘇聯大得多。蘇聯從未在經濟上對美國構成挑戰。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歷史估計顯示，在冷戰期間，蘇聯的經濟規模從未超過美國經濟的44%。根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這種演算法，中國經濟自2014年起就超過了美國，它把中國生活成本較低這一事實考慮了進來。蘇聯永遠無法從充滿活力的私營經濟獲取資源，但中國可以。在一些市場，特別是金融技術方面，中國已經領先於美國。

所以，2019年不是1949年，不論這場新冷戰會如何冷，中國都有足夠的實力和優勢，蔑視一切「人權牌」的挑釁，不屑於「新疆牌」「香港牌」的聒噪，在貿易戰和新冷戰中與美國抗爭到底。

# 「人權牌」意在「貿易戰」和「新冷戰」